

农村市场化、社会资本与 农民家庭收入机制*

王 晶

提要:市场化给传统农业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本文利用 2002 年 CHIP 数据,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初步探讨了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及其变化。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生产部门,家庭的网络规模会显著提高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家庭外部网络会显著提高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收入,而社区社会资本会显著提高社区成员的在地工资收入。第二,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是不平衡的,东部地区市场化和村庄内部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一致的,社会资本的作用随着两种市场化力量的深化同时加强。而西部地区市场化和村庄市场化对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力是反向的,随着村庄市场化的加深,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逐步强化,但是外部市场化的力量却会反向削弱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

关键词:村庄市场化 地区市场化 社会资本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世代定居在一定边界的社区之内,家庭是人们组织生产和社会得以运作的最根本的细胞和单元,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为依据而形成的家庭又逐步扩展为保持一定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的组合和群聚,形成了传统的家庭社会(李伟民,1996)。这样的社会通常是小型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费孝通,1998/1948),乡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梁漱溟,1987/1949)。梁漱溟这里所说的“伦理关系”不等同于今天我们常用的“社会网络”,它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还蕴含着集体的社会联系,“指明相互间应有之情与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健康的影响”的成果,感谢李实和魏众老师提供数据,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文责自负。

义”(梁漱溟,1987/1949),显示了农村社会内部无为而治的社会规范。20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市场化给当代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体现在家庭关系一端,杨善华、侯红蕊(1999)指出,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出现“理性化”趋势,姻亲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使得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加广泛,远超出社区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集体社会联系一端,原来以家族、血缘维系起来的熟人社会,在市场环境下,也需要培育一种与市场体系相容的社会组织和适应市场运行规则的社会规范。以往研究市场化与社会资本关系的文献主要从社会网络的思路来分析市场化的变迁过程,这样可能会忽略传统农村社区集体适应市场化的过程。本研究试图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调查数据(CHIP),从家庭社会资本和村庄社会资本两个视角出发,分别探讨市场化过程对两类社会资本的影响。这样的好处在于,在理解家庭社会网络变迁的基础上,将集体作为一个更重要的社会主体,考察其是不是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具有能动地适应市场化的能力。

一、文献评述

(一) 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视角

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视角。第一种是从微观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个体嵌入于网络内的资源(Granovetter,1973),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通过调动社会资源,使行动者获得更好的职业地位或商业机会,从而影响行动者的收入回报(林南,2005)。第二种视角是从集体的视角出发,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信任、网络和规范(帕特南,2011),它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背景,通过协调经济主体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这个概念界定后来被经济学研究普遍接受。

从微观社会网络研究视角出发,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从个体的角度将社会网络视为达成个人工具性目的的手段,认为网络中的弱关系能够起到信息桥梁的作用,从而为行动者提供非重复的信息,使求职者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Granovetter,1973);林南发展了“弱关系”理论,提出社会资源理论(Lin,1982)。该理论认为不同阶层的人

们其社会关系具有异质性,所以当个体在追求工具性目标时,这种异质性的社会关系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资源,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边燕杰(Bian,1997)基于中国文化背景拓展了“弱关系理论”,他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弱关系背后大多隐藏着一个强关系的桥梁,在中国市场化背景下,求职者一方面需要拓展弱关系增加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制度缺陷,因此,人们通过强关系的网络桥能够获得更加实质性的帮助。综合来看,这一研究脉络将焦点集中于“个体”,网络是作为个体获得资源的一个手段和途径,网络的最终目的在于其“工具性”本质。

对于集体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开始源于政治学。那么集体的社会资本究竟是否具备资本的特性呢?一些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进行了丰富的论述。帕特南是较早对集体性社会资本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他提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帕特南,2011)。通过分析意大利地方公共部门的效率,帕特南认为,地方自治组织是保证地方政府高效能的基础。在社会组织发达的南部地区,地方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也明显优于北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地方自治组织的发展,它的功能体现在监督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实施绩效,这种监督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比如让代理人加入到地方社会网络之内,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即监督公共服务的供给。

奥斯特罗姆(2000)则是从公共治理理论出发阐释了社会资本中“信任和规范”的功能。通过对菲律宾桑赫拉的灌溉项目研究,奥斯特罗姆发现,落后地区的农民为了能够持续地获得灌溉用水,选择了互相合作,通过互相协商,共同体共同确定谁来分担灌溉系统兴建与维护的成本,怎样分配收益,以及怎样监督各种行为以确保那些遵守自组织治理系统规则的人不会被那些欺诈之徒所利用。这些过程不是自动的或者确定性的,关键在于,在这种共同体中,农民处于面对面的关系之中,而这些关系将信守诺言视为相当重要的资产,农民相信其长期收益将超过长期成本(奥斯特罗姆,2000)。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团体和社区内部的合作、信任在解决公共资源分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结果正如奥斯特罗姆所描述的,“如果人们同意协作行动并对未来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那么,不论运用什么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体成员都将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奥斯特罗姆,2003)。

柯武刚、史漫飞(2000)则是从制度经济理论的视角关注到社会资本中“非正式规范”的作用。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是抑制市场机制的重要因素,而集体行为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费用,激励个体在产品、信贷和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交易,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这其中有两种可能的机制:一是社会资本有助于贷款方和借款方进行更好的信息交流,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社会资本也可以潜在地强化违约行为的惩罚机制,这些通常在正规法律体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在紧密的社会联系中建构他们的经营网络,可以显著提高他们参与经济交易的能力。在海外华人移民中,这样的非正式规范对于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比如在巴黎温州移民中,移民为谋求经济发展,建立了“钱会”的规则,每月按期将一定比例资金注入钱会,然后每个会员都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这笔资金,无需支付利息或只需支付很低的利息,这笔资金周而复始,在会员之间循环使用。一部分温州商人就是通过这种原始的筹资方式获得第一笔资金进行生产经营,生意逐步做大做强(王春光,2000)。

(二) 市场转型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与社会资本本身的收入效应相比,农村社会资本在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变化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传统精英的优势地位将逐步让位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技术精英,这也是市场机制最根本的特征。而罗纳-塔斯(Rona-Tas, 1994)、林宗弘、吴晓刚(2010)等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精英阶层的地位不仅不会衰落,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权威体系在进一步的市场化过程中仍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有可能是一种社会资本嵌入式的发展过程。这两种理论对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张文宏、张莉(2012)分析认为,这两种认识可能是源于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两种不同解读。一方面,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推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市场制度是不相容的,部分学者循着这个路径,将社会资本发挥资源配置的机制与市场化的机制相互独立,认为社会资本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陆铭等,2010;赵延东、风笑天,2000);另一方面,格兰诺维特又提出“嵌入”的观点,从

这个观点出发,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配置资源的机制又是相互嵌入的,部分学者以此为基础,强调市场嵌入在社会资本中,在市场化的不同阶段或者市场化程度不同的部门(如体制内和体制外),社会资本的作用都会存在,只是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边燕杰,2007;边燕杰、张文宏,2001;张顺、程诚,2012)。

对于市场化转型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大部分学者将焦点放在了劳动力市场上。边燕杰较早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文革之后,中国人善于动用各种各样的“强关系”来获取包括工作机会在内的个人利益,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Bian,1997)。后续的一系列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观点进行印证,比如边燕杰、张文宏的研究提出了“社会网络空间”和“体制洞”的概念,他们认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洞,给社会网络创造了活动的空间。社会网络通过信息和人情两种机制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化,信息机制的作用不仅没有加深反而逐渐减弱,与此同时人情机制的作用不断上升(边燕杰,2007;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最近的研究又提出了“体制性资源”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使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两种体制并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体制性资源。当个体的关系网络跨越两种体制时,将产生跨体制的社会资本,而体制跨越者将获得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经济回报(边燕杰等,2012a)。张文宏最近的研究系统性地对市场化的不同测量方式进行了梳理和验证,他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含金量”,同时提升了社会资本的“认可度”(张文宏、张莉,2012)。张顺、程诚的研究将社会网络资本区分为“潜在的”和“动员的”两种形式,他们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潜在性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回报递减,但动员性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递增,而递增的速度也是衰减的(张顺、程诚,2012)。综合来看,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研究,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嵌入性”的理论。

相对于在劳动力市场领域探讨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研究而言,对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变迁研究则比较稀少。张爽等以农村贫困为例,以樊纲、王小鲁(2004)测算的地区市场化指数为农村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探讨了市场化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该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

总体上来说会减少,其中,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减少得尤其显著,而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却不会显著下降(张爽等,2007)。陆铭等从“传统农村社会资本是否还能充当保险机制的问题”出发,以村庄市场化水平为农村市场化的代理变量,探讨了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过程中,随着非农就业的增加和外出打工的增多,农村居民运用社会资本来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的能力被削弱了(陆铭等,2010)。赵剑治、陆铭(2009)则是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有多大”这一问题出发,也以樊纲、王晓鲁(2004)测算的地区市场化指数为农村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2.1%至13.4%,同时不同地区社会网络的贡献存在很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社会网络的贡献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在已有的农村市场化和社会资本研究文献中有两个模糊的区域,一是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目前主要还是集中于个体或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家庭社会网络数量和是否有外部社会关系来测量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同时采用社区信任衡量农村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在模型中同时考虑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二是关于市场化的测量,由于农村市场化过程比较复杂,所以大部分学者采用了地区市场化作为农村市场化的代理指标。本文倾向以农村社区“在地非农就业比例”来衡量农村市场化程度,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并不同步,特别是传统上城乡二元经济的发展模式在部分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纠正,有的甚至出现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地区市场化和农村自身的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可能并不一致。本文将分别检验村庄市场化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对农村的社会资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回答不同的市场化过程下家庭、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到底会随之减弱还是加强的问题。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CHIP)开展的一项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质量调查,本次调查覆盖北京、山东、河北、江苏、浙江、四川等22个省,961个村庄,调查农村常住

户 9200 户。这些样本是国家统计局农村家庭调查的子样本,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样产生,在每个村庄随机选择 10 个左右的家庭作为调查对象。由于本文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因此我们在处理数据时将村庄数据和家庭数据进行了匹配;另外,本文还希望检验地区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我们还对家庭数据和各省的市场化数据进行了匹配。

(一)解释变量:家庭收入

家庭年收入是本研究的因变量。传统上农村家庭是一个共同生产单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根据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家庭农业收入的比例占 50%,其次是家庭成员在地非农工资性收入,约为 20%,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各占 10% 左右。东中西三个地区在收入结构上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家庭农业收入比例最低,为 38%,家庭成员在地的工资性收入^①比例最高,为 27%;而西部地区家庭农业收入比例最高,为 61%,家庭成员在地的工资性收入比例最低,为 13% (参见图 1)。基于这个特点,我们将分别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家庭农业收入、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家庭成员在地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的影响。因变量为每个类型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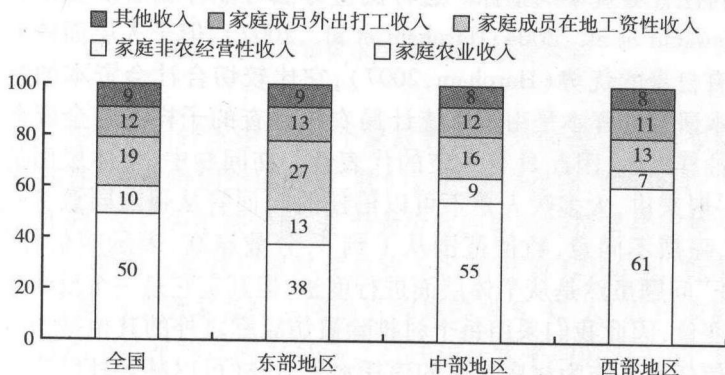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家庭收入结构

① 在地工资性收入是指在本地企业中就业所获的工资性收入。

(二) 自变量: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目前对社会资本尚没有一致性的度量方法。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包含“网络、信任、规范”,我们采用了帕特南对于集体性社会资本的测定。在应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时,必须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测量,不能一味地套用西方的关系社会网络的测量方式,而需更加明晰地反映出传统的社会联系,或者说在具体的测量上要嵌入文化的要义。本文结合社会资本的概念和中国的“关系”文化,分别从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

首先,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的度量,我们采用了两个指标:(1)对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进行度量。问卷中没有直接的问题,我们通过“2002年一共给多少熟人朋友送礼”来衡量,这种动员性的社会网络虽然不能反映农民全部的社会网络,很有可能低估社会网络的作用,但由于问卷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农民社会交往的范围。(2)对家庭外部社会关系进行度量。我们通过问卷中“是否有县城或城市生活的亲戚朋友”来衡量外部网络。目前,大部分农村家庭都有外出迁移劳动力,城市的亲戚朋友可能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提供信息、居住或其他方面的经济支持。

其次,对于村庄社会资本的度量,我们由个人的变量值汇总、平均而成村庄社会资本的指标。这种测量方法可能存在着层次谬误的问题(Kawachi et al., 2004; Harpham et al., 2002),但个人层面的测量指标具有自身的优势(Harpham, 2007),它比较切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本研究的样本是由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的子样本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样产生,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问卷中,个体层面的问题是“一般来讲,大多数人是不可信任的”,回答从强烈同意、同意、不同意、强烈不同意,数值范围从1到4,分数越高,表示越信任他人。“信任”问题虽然是从个体层面进行度量,但其实它是一个反映集体特征的变量,因此我们采用每个村排除被访家庭之外的其他被访家庭的平均信任水平作为村庄集体的信任水平,这样可以减轻社区层面的社会信任的联立性内生问题。

(三) 市场化

樊纲、王小鲁等(2004)构建了一个省级市场化指数,使用5个

种类^①的 23 个指数。根据这个市场化指数,2002 年中国省级的市场化指数从西藏的 0.63 到广东的 8.62 不等。但是从这些宏观的市场化指数中,我们可以捕捉的农村市场化发展水平的信息有限。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希望在村级层次上衡量农村市场化的水平,在中国农村的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特征是非农部门的增长,我们用村庄在地的非农就业比例来衡量村庄市场化指数。另外,为了与村级市场化水平进行对照,我们将省级市场化指数同比例缩小到 0-1 之间。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村级市场化程度与省级市场化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市场化指数最高的广东省,村级市场化水平仅处于中等水平。下文中我们将分别检验不同地区不同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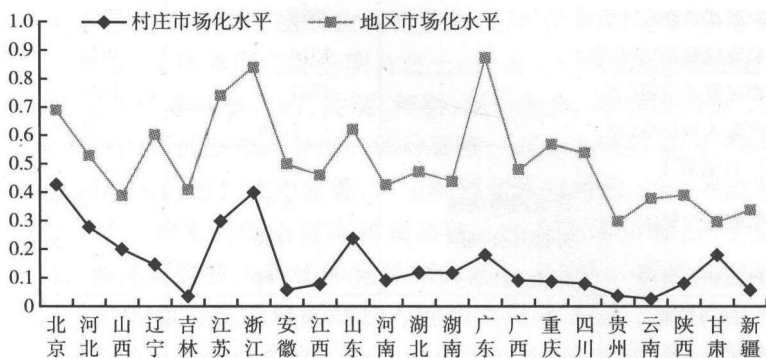


图 2 地区市场化水平与村庄市场化水平

表 1 中我们对样本中 9155 个家庭数据对应的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以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为中共党员、是否为少数民族等特征来代表整个家庭的特征。主要因变量农户家庭年总收入的均值为 12166 元,标准差为 10395。主要自变量家庭社会网络平均规模为 8.42 人,农户家庭中有城市亲戚朋友的平均比例为 56%。村庄信任水平平均值为 2.68,相对城市来说是较高的信任水平。村庄非农就业的平均比例为 15%,省级市场化平均水平为 0.61,样本中最低的贵州 0.30,最高的是广东 0.86。

① 5 个种类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表 1 模型统计量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个人及家庭特征		
户主男性	.95	.21
户主年龄	46	10.7
户主已婚	.95	.22
户主受教育年限	7.55	2.67
户主为少数民族	.17	.37
户主为中共党员	.18	.38
家庭总收入(元)	12166	10395
家庭农业收入	5208	5565
家庭非农经营收入	1585	4978
家庭成员在地工资收入	2685	5748
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	1514	3522
固定资产价值(元)	1227	3525
家庭人均耕地(亩)	1.96	2.16
2. 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	8.42	10.91
社会网络规模		
外部社会网络	.56	.49
村庄社会资本	2.68	.67
村庄信任水平		
3. 村庄特征		
村庄到乡镇的距离(公里)	4.83	5.15
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公里)	24.15	20.59
村庄非农劳动比例	.15	.20
4. 地区特征		
省级市场化指数	.61	.16
东部地区的家庭	.38	.48
中部地区的家庭	.35	.48

(四) 研究模型

本文着重考察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村庄社会资本的经济回报,因此选择农户家庭年收入及分项收入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已有文献中影响家庭年收入的重要因素包括家庭资产、家庭人口特征和区域特征,家庭资产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产(Narayan & Pritchett,1997;Grootaer,1999)。因此本文的基本模型为:

$$\log(y_{ij}) = \beta_0 + \beta_1 x_{1ij} + \beta_2 x_{2j} + \beta_3 x_{3ij} + \beta_4 x_{4ij} + \beta_5 x_{5ij} + \sum \beta_k x_{k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y_{ij} 为农户家庭年收入及分项收入, x_{1ij} 为家庭社会资本, x_{2j} 为村庄集体社会资本, x_{3ij} 代表人力资本, x_{4ij} 为政治资本, x_{5ij} 为物质资本, x_{kij}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在分析市场化影响模型中,我们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放入了市场化和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以检验市场化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三、农村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回报

本部分首先探讨的问题是在农村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是否还具有收入回报,具体体现在哪些项目之上(见表2)。从基准模型看,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是显著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实物资产等都是收入差异的解释要素。其他条件不变时,户主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增长作用显著,户主教育水平每增加1年,家庭收入将增加1.8%。户主的政治资本对家庭收入也有显著贡献,户主是党员的家庭,整体家庭收入将比非党员家庭增加8.2%。而从家庭特征看,家庭外出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是最高的,边际贡献率为83%,也就是说一个四口之家中一个外出劳动力将使家庭收入增加约23%。其次,家庭的物质投入对收入的贡献也比较高,家庭固定资产每增加1元,家庭收入将增加12.5%。家庭固定资产包含了“农用机械、工业机械、运输机械等”,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机械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替代,农业机械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显著提高。此外,家庭土地每增加1亩,家庭人均收入将增长1.5%。从村庄的特征看,村庄的基础设施会对村民的收入带来显著的正效应,通公路的村庄比没有通公路的村庄平均收入水平高7.8%。而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村庄距离县城每增加1公里,人均家庭收入就将降低0.2%。

模型1考虑了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从回归结果看两类社会资本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都是显著的,其中,家庭网络规模每增加1人,家庭收入水平将增加0.3%。城市中有亲戚朋友的家庭将比没有亲戚朋友的家庭收入高6.2%。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虑家庭社会

资本对收入的贡献时,“政治资本”对收入的贡献降低了,这进一步说明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家庭社会网络来实现的,正如毛丹、任强(2003)所分析的,家庭政治资本即是一种象征性资本(符号资本),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发挥其提高收入水平的功能。模型2进一步考虑了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从回归结果看,村庄的公共信任水平对家庭收入水平的贡献为0.8%,但并不显著。

模型3、4、5、6分别考虑家庭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对家庭农业收入、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的贡献。市场转型环境下,每类家庭收入产生的市场环境并不相同,所以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就会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分离不同类型的家庭收入,更进一步地考察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从对家庭农业收入的贡献看,两类社会资本的作用均不显著。从对家庭非农经营的贡献看,家庭网络规模对非农经营的贡献是显著的,家庭网络规模扩大1人,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将提高0.3%;从对家庭在地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看,村庄的社会资本的贡献是显著的,村庄社会资本每提高1个标准差,家庭成员在地工资性收入将增加6.9%;从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收入的贡献看,家庭外部网络资源的作用是显著的,有城市亲戚朋友的家庭其家庭成员打工收入比没有城市亲戚朋友的家庭高3.5%。

上述结果对于我们思考农村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是有启发的。传统农业是距离市场最远的产业,同时也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最薄弱的部门;家庭非农经营的产业已经接近市场部门,通常以社区和乡镇为服务半径,家庭社会网络在这个环境下对非农经营有显著的作用;而家庭外出务工成员已经进入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章元、陆铭利用同一套2002年的CHIP的数据专门探讨了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结果发现,社会网络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它不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但是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章元、陆铭,2009)。这也间接印证了我们题中的假设。比较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村庄的社会资本会显著影响微观水平上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这可能与农村乡镇企业的性质有关,乡镇企业产生于社区母体之中,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里的企业”,它同时也是一种“社区里的企业”,企

业的经济活动深深“嵌入”于社区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其原始积累阶段所利用的土地和劳力乃至某些启动资金,都直接取自社区,并且是以共同体内的信任结构和互惠规则作为“出让”的社会性担保的,其收益主要是在企业与村集体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分配。对于社区成员来说,工业化、市场化导致他们的“土地权”向“就业权”和“福利权”转换。即便在后来大部分乡镇企业改制之后,乡镇企业仍然有责任和义务满足社区成员的就业需求(折晓叶、陈婴婴,2005)。在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下,村庄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使用社区资源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和争议,使得内部更有效地合作,从而形成一种建立在社区共同体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命运共享”、“同甘共苦”式的社会激励机制,保障企业稳定盈利的同时也保障个人的经济利益稳步提升(折晓叶、陈婴婴,2004)。

“市场转型论”的代表倪志伟(Nee,1989)将市场化与个人特征相联系,提出市场化意味着政治资本回报降低而人力资本回报增高的假设,但是后来的很多学者都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中设置了四项家庭收入类型,它们来源于市场化程度不同的部门,通过比较各类资本对不同类型家庭收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农村市场化背景下各类要素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社会资本概念比较抽象,单独探讨社会资本的贡献比较困难,而通过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的比较,更能体现社会资本的价值。

由于各种资本的单位不一致,单纯从偏回归系数上并不能比较各个要素的重要性差异。因此,我们计算了模型3至模型6回归结果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见表3),来比较不同资本对家庭收入贡献的相对程度。模型3显示在家庭农业收入中,土地资本的贡献是最高的,达到了0.182,固定资产的贡献为0.176。模型4显示在家庭非农经营收入中,固定资产的贡献最高,为0.198,其次是人力资本,为0.054,家庭网络规模居于第三,为0.019。^①模型5显示在家庭成员在地工资性收入中,政治资本的贡献最高,为0.080,其次为人力资本,为0.055,社区社会资本居于第三,为0.029。模型6显示在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中,家庭外部资源的贡献最高,为0.014。综合来看,在农村市场化环

① 前文我们提到问卷测量的动员型社会网络可能还会低估社会网络的贡献,所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对收入的贡献比这个水平可能还高一些。

表2 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

变量	基准模型(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1(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2(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3(家庭农业收入对数)	模型4(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对数)	模型5(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对数)	模型6(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对数)
家庭网络规模(送礼人数)		.003*** (.001)	.003*** (.001)	.001 (.001)	-.003* (.015)	.003 (.002)	.003 (.002)
家庭外部资源(参照:无城市亲友)		.062*** (.013)	.056*** (.013)	.018 (.020)	.097 (.064)	.014 (.044)	.035** (.015)
村庄社会信任水平			.008 (.010)	-.020 (.015)	.021 (.047)	.069** (.033)	.020 (.032)
户主性别(参照:女性)		-.140*** (.035)	-.148*** (.037)	.208*** (.056)	-.399** (.188)	-.278** (.118)	-.169 (.125)
婚姻状况(参照:未婚)		.158*** (.033)	.149*** (.033)	.159*** (.035)	-.065 (.175)	.313** (.122)	.204* (.105)
户主年龄		.002* (.001)	.002 (.001)	.004** (.002)	-.011* (.006)	-.004 (.005)	-.005 (.005)
户主年龄平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户主教育程度		.018*** (.003)	.017*** (.003)	.017*** (.003)	.040*** (.014)	.034*** (.009)	-.001 (.009)
户主政治面貌(参照:非党员)		.082*** (.017)	.072*** (.017)	.071*** (.018)	.014 (.027)	.299*** (.054)	-.092 (.060)
户主少数民族(参照:非少数民族)		-.067*** (.020)	-.079*** (.020)	-.080*** (.021)	-.005 (.032)	-.318*** (.075)	-.367*** (.073)

续表 2

	基准模型(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1(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2(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3(家庭农业收入对数)	模型4(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对数)	模型5(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对数)	模型6(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对数)
家庭规模	.117*** (.005)	.117*** (.005)	.118*** (.005)	.115*** (.008)	.060** (.026)	.084*** (.018)	.172*** (.017)
家庭外出人口比例	.830*** (.029)	.820*** (.029)	.827*** (.030)	-.850*** (.046)	1.130*** (.137)	2.140*** (.099)	1.700*** (.118)
家庭人均土地	.015*** (.003)	.014*** (.003)	.013*** (.003)	.073*** (.005)	-.093*** (.016)	-.037*** (.010)	-.046*** (.013)
家庭人均固定资产	.125*** (.005)	.122*** (.005)	.121*** (.005)	.127*** (.008)	.268*** (.023)	.022 (.017)	-.152*** (.018)
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	-.002*** (.000)	-.002*** (.000)	-.002*** (.000)	.001 (.000)	-.008*** (.002)	-.004*** (.001)	.001 (.001)
村庄是否通公路 (参照:未通公路)	.078** (.031)	.077** (.031)	.073** (.033)	.057 (.048)	-.102 (.157)	.142 (.108)	.228** (.101)
东部地区	.348*** (.017)	.354*** (.017)	.348*** (.018)	.053** (.026)	.638*** (.084)	.506*** (.058)	.582*** (.058)
中部地区	.150*** (.017)	.145*** (.017)	.145*** (.017)	.207*** (.026)	.290*** (.083)	-.006 (.059)	.167*** (.056)
常数项	7.064*** (.080)	7.056*** (.080)	7.068*** (.088)	6.261*** (.131)	5.312*** (.420)	5.881*** (.293)	7.194*** (.282)
观测值	7909	7909	7246	7114	3063	4165	2448
拟合 R ²	.293	.297	.295	.191	.157	.220	.222

注:(1)括号中为标准误。(2)*代表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1%的水平上显著。

境下,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家庭非农经营领域、家庭成员在地就业和外出打工中,从相对贡献看,社会资本的贡献低于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贡献,但从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还是影响家庭非农收入的重要因素。

表 3 主要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变 量	模型 3(家庭农业收入对数)	模型 4(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对数)	模型 5(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对数)	模型 6(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对数)
家庭网络规模: 送礼人数		.019 *		
家庭外部资源: 城市的亲戚				.014 **
社区社会资本			.029 ***	
人力资本: 户主教育程度		.054 ***	.055 ***	
政治资本: 户主政治面貌			.080 ***	
实物资本: 人均土地	.182 ***	-.104 ***	-.052 ***	-.066 ***
实物资本: 人均固定资产	.176 ***	.198 ***		-.155 ***

注:对偏相关系数需进行 t 检验,* 代表 10% 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 5% 的水平上显著,*** 代表 1% 的水平上显著。

四、村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变化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在农村市场化环境下社会资本是否还具有收入回报,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三类家庭非农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农业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本部分以“村庄非农就业人口比例”来衡量农村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检验农村市场化过程下农村社会资本的作用发生了何种变化。为了控制模型中变量的共线性问题,每个模型中都将进入交互项的变量进行了对中处理,^①同时对家庭

① 家庭是否有外部资源为虚拟变量,取值为 0 或 1,无需对中处理(参见谢宇,2010)。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进行分别讨论。

有关家庭社会资本的变化结果见表4。首先从农村市场化本身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家庭成员在地工资性收入水平会显著提升,而农业收入会显著下降。模型1中家庭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交互项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社会资本对各类家庭收入的影响方向不同,总的影响就互相抵消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按收入类型或分地区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变化。本部分我们按收入类型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的变化,下一部分将分地区考察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

表4 家庭社会资本在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的作用变化

	模型1(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2(农业收入对数)	模型3(家庭经营收入对数)	模型4(家庭工资收入对数)	模型5(外出打工收入对数)
家庭网络规模 ^a	.003 *** (.001)	.001 (.001)	.003 (.003)	.004 ** (.002)	.002 (.003)
家庭外部资源	.057 *** (.013)	.014 (.020)	.104 (.064)	.029 (.043)	.066 (.047)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471 *** (.040)	-.828 *** (.061)	.965 *** (.180)	1.654 *** (.120)	-.123 (.161)
家庭网络规模 ^a ×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001 (.004)	.002 (.005)	.030 ** (.015)	.000 (.012)	-.014 (.018)
家庭外部资源 ×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007 (.072)	-.079 (.109)	-.288 (.318)	-.327 (.207)	.571 * (.297)
观测值	7246	7114	3063	4165	2448
拟合R ²	.308	.213	.166	.256	.223

注:(1)表中所有控制变量均已包括,但没有报告。(2)括号中为标准误。(3)*代表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1%的水平上显著。(4)家庭网络规模^a=家庭网络规模-家庭网络规模均值,村庄市场化水平^a=村庄市场化水平-村庄市场化水平均值。

模型2至模型5显示,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模型3中家庭网络规模与市场化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家庭非农经营领域,家庭社会网络的收入回报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加

深。这个结果与张爽等(2007)的研究结论相反。张爽等的研究结果认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机制,减弱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没有支持这个假设,在市场化过程下,与“谁”互惠,对“谁”扩张社会网络,这些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渗透着个人的功利性选择,而这背后的因素可能是在市场环境下,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模型5中,家庭外部网络资源与市场化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市场化过程中,家庭外部网络对外出打工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结果再一次证明了章元、陆铭(2009)的判断,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家庭的外部网络也会通过某种资源配给方式影响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有关社区社会资本的变化结果见表5。模型1中社区信任水平与村庄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为正,这表明村庄社会资本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随着农村市场化的增强而增强。在四个分类回归模型中,只有模型4,即家庭成员在地工资性收入的回归模型中,农村市场化水平与村庄社会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前文中我们提及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具有显著贡献,因此这个结果可能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可能会推动村庄市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村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也会显著提高。在农村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民与市场的连接枢纽在乡镇企业,在市场化初期,村集体、农民提供了原始积累阶段所需的土地和劳力资源,农民、村集体与乡镇企业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在逐步深化的市场化过程中,企业逐渐脱离社区,成为纯粹的市场化主体,但是乡镇企业嵌入于社区的本质没有改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乡镇企业仍然有利用村庄土地资源的优先权,理所当然地,企业有义务满足社区成员的“就业权”和“福利共享权”。这个互动的过程与传统上单纯是市场化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过程有所不同。其实社会资本的强化也有可能反向推动村庄的市场化进程,村民之间的合作既提高成员之间的资源分配和自我管理能力,也推动了乡镇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化步伐,更增加了村民自身的非农收入水平,这是一个村集体、企业和村民都受益的过程。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村庄社会资本的公益性质,农民一向是城市化、市场化的弱势群体,通过集体的合作提高了农民集体适应市场化的能力,而不至于被快速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所边缘化。

表 5 社区社会资本在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的作用变化

	模型 1(家庭总收入对数)	模型 2(农业收入对数)	模型 3(家庭经营收入对数)	模型 4(家庭工资收入对数)	模型 5(外出打工收入对数)
社区信任水平 ^a	.016 * (.010)	-.028 * (.015)	.024 (.047)	.054 * (.032)	.000 (.034)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474 *** (.040)	-.835 *** (.060)	.944 *** (.179)	1.637 *** (.117)	-.102 (.157)
社区信任水平 ^a ×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225 *** (.053)	-.129 (.080)	-.261 (.241)	.745 *** (.159)	-.383 * (.216)
观测值	7246	7114	3063	4165	2448
拟合 R ²	.310	.213	.165	.259	.223

注：(1)表中所有控制变量均已包括，但没有报告。(2)括号中为标准误。(3)*代表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1%的水平上显著。(4)社区信任水平^a = 社区信任水平 - 社区信任水平平均值；村庄市场化水平^a = 村庄市场化水平 - 村庄市场化水平平均值。

五、村庄市场化与地区市场化

村庄的市场化会促进社区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那么在地区市场化推进下，社会资本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是不平衡的，这不仅表现在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同时在地区内部市场化水平也有差异，本部分将分东、中、西三个地区来比较不同的市场化进程下，地区市场化是不是也能强化社会资本的作用？如若不是，那么地区市场化与村庄市场化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分别对社会资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表 6 中报告了家庭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区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通过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会降低家庭网络规模的作用，但会显著提高家庭外部资源的作用，相对来说村庄市场化的过程对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比较模型 3 和模型 4，中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会显著地提高家庭网络规模和外部资源的作用，而村庄市场化的过程会提高家庭网络规模的作用。比较模型 5 和模型 6，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对两类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村庄的市场化过程会显著降低家庭外部资源的作用。综合来看，地区的市场

化过程倾向于扩大外部社会网络的作用空间,而村庄的市场化过程倾向于扩大内部社会网络的作用空间。

表 6 不同区域市场化过程对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模型 1 (地区市场化)	模型 2 (村庄市场化)	模型 3 (地区市场化)	模型 4 (村庄市场化)	模型 5 (地区市场化)	模型 6 (村庄市场化)
家庭网络规模 ^a	.006 *** (.002)	.003 ** (.001)	.011 *** (.002)	.006 *** (.001)	.000 (.002)	.002 ** (.001)
家庭外部资源	-.035 (.034)	.035 (.024)	.140 *** (.034)	.074 *** (.021)	.058 (.040)	.036 (.027)
地区市场化水平 ^a	.175 *** (.009)		.006 (.026)		-.011 (.014)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628 *** (.058)		.179 *** (.069)		.157 * (.092)
家庭网络规模 ^a × 地区市场化水平 ^a	-.002 ** (.001)		.009 *** (.003)		-.001 (.001)	
家庭网络规模 ^a ×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005 (.006)		.020 *** (.005)		.003 (.005)
家庭外部资源 × 地区市场化水平 ^a	.031 * (.017)		.113 ** (.048)		-.001 (.023)	
家庭外部资源 ×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109 (.100)		-.058 (.137)		-.316 * (.183)
观测值	2590	2811	2566	2793	2090	2305
拟合 R ²	.398	.328	.212	.214	.212	.216

注:(1)表中所有控制变量均已包括,但没有报告。(2)括号中为标准误。(3)*代表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1%的水平上显著。(4)家庭网络规模^a=家庭网络规模-家庭网络规模均值;村庄市场化水平^a=村庄市场化水平-村庄市场化水平均值;地区市场化水平^a=地区市场化水平-地区市场化水平均值。

表 7 报告了社区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区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通过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会显著提高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而村庄的市场化过程也会显著提高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与村庄的市场化过程的影响是一致的。比

较模型 3 和模型 4,中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和村庄的市场化过程对村庄社会资本的影响都不显著。比较模型 5 和模型 6,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会显著降低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而村庄的市场化过程会显著提高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地区市场化与村庄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个结果对我们理解市场化和社会资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才能发挥作用,而脱离了这个社会空间,社会资本的作用就会严重贬值。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对于村庄来讲,主要是一个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过程,在以“外出打工”为特征的农村市场化过程中,村庄集体社会资本的作用显著降低,这一过程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外出打工”为主的农村社会,农村整体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青壮年的劳动力外出,农村剩下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和老年,原有的监督、合作、互惠机制逐渐趋于衰落。科尔曼(Coleman,1988)在研究社会资本时强调,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使闭合性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关键,稳定的社会结构使生活在共同体之内的人们积累起长期的信任,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稳定的预期,同时对于违反互惠合作规范的人给予“惩罚”。但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人们不再世代定居一处,新型的法人组织代替了传统的农村社会,正式的制度规则逐渐取代非正式的制度规则,传统的集体性的社会资本形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削弱。

表 7 不同区域市场化过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模型 1 (地区市场化)	模型 2 (村庄市场化)	模型 3 (地区市场化)	模型 4 (村庄市场化)	模型 5 (地区市场化)	模型 6 (村庄市场化)
社区信任水平 ^a	.015 (.026)	.029 (.019)	-.011 (.024)	-.027 * (.016)	-.009 (.031)	.061 *** (.022)
地区市场化水平 ^a	.182 *** (.009)		-.006 (.026)		-.013 (.014)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606 *** (.058)		.111 (.073)		.405 *** (.112)
社区信任水平 ^a × 地区市场化水平 ^a	.031 ** (.013)		.027 (.033)		-.014 * (.016)	

续表 7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模型 1 (地区市场化)	模型 2 (村庄市场化)	模型 3 (地区市场化)	模型 4 (村庄市场化)	模型 5 (地区市场化)	模型 6 (村庄市场化)
社区信任水平 ^a × 村庄市场化水平 ^a		.184 ** (.084)		-.137 (.101)	.542 *** (.148)	
观测值	2590	2590	2566	2566	2090	2090
拟合 R ²	.397	.330	.0206	.194	.212	.214

注:(1)表中所有控制变量均已包括,但没有报告。(2)括号中为标准误。(3)*代表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1%的水平上显著。(4)社区信任水平^a = 社区信任水平 - 社区信任水平平均值;村庄市场化水平^a = 村庄市场化水平 - 村庄市场化水平平均值;地区市场化水平^a = 地区市场化水平 - 地区市场化水平平均值。

六、结论与启示

农村市场化的过程给传统农业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本文从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两个视角出发,初步探讨了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条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静态结果看,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业生产部门,家庭的网络规模会显著提高非农经营性收入,家庭外部网络会显著提高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入,而社区的社会资本会显著提高社区成员的在地工资收入。第二,我们以“村庄非农就业”衡量了农村市场化的过程,社会资本在不同市场空间的变化略有差异,随着农村市场化的深化,家庭社会网络对非农经营性收入的回报逐步提高,家庭外部网络资源对外出打工收入的回报逐渐提高,而村庄社会资本对社区成员在地工资性收入的回报是逐渐提高的。第三,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是不平衡的,导致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分别从村庄市场化和地区市场化两个角度来观察不同区域的市场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从家庭社会资本的变化看,三个地区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随着外部地区市场化力量的深化,家庭外部资源的作用逐渐强化;而随着村庄内部市场化过程的加深,家庭网络规模的作用逐渐加深。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变化看,三个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在东部省份,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随着村庄内部市场化的深化而加深,同时外部地区的市场化又助推了这种趋势,随着外部市场化的推动,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又有所加强。在西部省

份,地区市场化和村庄市场化对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力是反向的,随着村庄市场化的加深,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也是逐步强化的,但是外部市场化的力量却会反向削弱村庄社会资本的作用,村庄社会资本随着地区市场化的深化逐步降低。

上述结果对于我们思考农村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市场转型理论(Nee,1989)强调市场化对农村社会的冲击,但没有对社会本身的反弹能力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卡尔·波兰尼(2007)看来,人类历史上不存在独立自主的市场,市场都是嵌入到社会和政治乃至文化之中的,当市场影响过大时,就会出现社会的“反向运动”。就东部农村的市场化实践而言,村庄市场化与村庄内向聚合力 and 自主性的加强同时并存,且互为因果和补充。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区结构不断膨胀和完善,社区的社会功能更加强化。东部农村的市场化过程是一种社区内生性的市场化过程,社区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相互强化、螺旋上升,市场化转型给社区社会资本提供了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而社区社会资本又反过来推动了农村市场化的进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宏观的市场化对农村的影响是以农村内在的市场化为基础的,村庄内部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为村庄适应外部市场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而西部农村地区的市场化实践却提供了相反的结果,外部市场化的力量与农村内部的社会资本是分离的,缺乏一个集体中介将市场化的力量与村庄内部社会资本的力量融合起来,随着外部市场的强化,大量强壮的劳动力资源被外部市场席卷走,乡村社会赖以维持的社会结构被动摇,社会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式微,伴随而来的就是村庄的萎缩。奥斯特罗姆(2003)在论述社会资本的意义时强调,社会关系所承载的社会资源(如信任)不同于普通资源或商品,它不会越加“善用”越少,而是越加“善用”越多。如果忽略它或消极地使用甚至不加以使用,它的存量就会降低。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然生成或事先存在的,而是需要(或者说是可以)不断激活、不断建构和不断积累的。传统农业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积累,家族、乡规民约、农村集体制文化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快速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西部农村市场化是严重滞后的,在外部市场冲击下,传统社会资本没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社会资源重构,更没有能力直接驾驭外部市场。相对来说,东部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经验表明,在市场化初期,村庄内部由农民的再组织行动适时地对传统社会资本重新激活和利用,将社会资本成功地嵌入于市场环境,

在更大的市场化冲击下,变通的社会资本就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化过程,而不至于被市场化打散。

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还在继续,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如何能够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巩固农村的社会基础,费孝通(1992/1983:149)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小城镇建设的理论:“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化发展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农村社会的萧条和衰落。我们从东部市场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些许启发。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化的力量是强大的,西部的市场化过程恰恰提供了反面的案例,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中农村是逐步衰落的,这也说明单独依赖社会的力量来回应或重塑市场化的力量在有些地区是达不到的。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政府最关键的角色就在于资源的再分配,如果将资源持续聚集在省、市一级,从经济指标上看自然可以提高规模经营的效率,提高GDP产值,但农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贡献了劳动力甚至土地资源,这两个最重要的资源被挖空之后,农村就彻底衰落了。反之如果政府将资源下移,逐步培育乡镇和村的市场化力量,农村内部的合作意识和集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重新撬动,通过农民自身的再组织,农村市场化可能会推动农村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

最后,我们对农村市场化和社会资本的关系探讨仅是初步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第一,关于市场化的测量问题。目前对于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测量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方法,农村非农就业比例只是从人口结构上衡量了农村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指标没有纳入进来。第二,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本文结合农村社会的传统,从社区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以社区平均信任水平作为村庄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第三,关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问题。边燕杰在研究个人社会网络收入回报中,提出了信息机制和人情机制,那么村庄社会资本具体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到家庭的收入水平?本研究只是做了第一步,分离了农村四种主要的家庭收入类型,确定了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市場空间,但是行动主体具体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影响到收入水平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的问题。

参考文献:

奥斯特罗姆,埃莉诺,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

-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2003,《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07,《社会网络理论十讲》,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
- 边燕杰、王文彬、张磊、程诚,2012a,《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边燕杰、张文宏,2001,《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a,《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社会》第3期。
- 波兰尼,卡尔,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樊纲、王小鲁,2004,《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2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费孝通,1992/1983,《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 ,1998/194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柯武刚、史漫飞,2000,《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路路,2002,《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理论与问题》,《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李伟民,1996,《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梁漱溟,1987/1949,《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
- 林南,2005,《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宗弘、吴晓刚,2010,《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第6期。
- 陆铭、张爽、佐藤宏,2010,《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 陆学艺,1991,《当代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第6期。
- 毛丹、任强,2003,《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
- 帕特南,罗伯特,2011,《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祝乃娟、张孜异、林挺进、郑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折晓叶、陈婴婴,2004,《资本怎样运作——对“改制”中资本能动性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2005,《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宋时歌,1998,《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谭琳、李军峰,2002,《婚姻和就业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基于社会性别和社会资本观点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第7期。
- 王春光,2000,《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谢宇,2010,《回归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善华、侯红蕊,1999,《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 张爽、陆铭、章元,2007,《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6期。

- 张顺、程诚,2012,《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顺、郭小弦,2011,《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文宏,2007,《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张文宏、张莉,2012,《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章元、陆铭,2009,《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管理世界》第3期。
- 赵剑治、陆铭,2009,《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经济学(季刊)》第1期。
- 赵延东、凤笑天,2000,《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
- 赵延东、罗家德,2005,《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
-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
- Bowles, S. & H. Gintis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Economic Journal* 112(483).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Durkheim, Emile 1964,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Grootaert, C. 1999,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No. 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Harpham, Trudy 2007, "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 In Idiro Kawachi, S. V. Subramanian & Daniel Kin (eds.),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New York: Springer.
- Harpham, T., E. Grant & E. Thomas 2002,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within Health Surveys: Key Issues."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7.
- Kawachi, I., Daniel Kim, Adam Coutts & S. V. Subramanian 2004, "Commentary: Reconciling the Three Accounts of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3.
-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eter V. Marsden &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Narayan, D. & L. Pritchett 1999, "Cents and Sociability: The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 Rona-Tas, A.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
- Wang, Xiaolu, Gang Fan & Hengpeng Zhu 2007, "Marketisation in China, Progress and Contribution to Growth." In Ross Garnaut & Ligang Song (eds.), *China: Linking Market for Growth*.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可

Rural Marketiz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Mechanisms of Rural Family Income *Wang Jing* 119

Abstract: Marketization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changes to rural society. Using 2002 CHIP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com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during rural marketization from both family and village level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incom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on-agricultural sectors—the size of family network has improved family non-agricultural income significantly, the external family network has improved migrant family members' income significantly,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has improved local wage-income significantly; secondly, 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is unbalanced—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village marketization in eastern provinces, but the direction of village marketization is opposite to regional marketization in western provinces; the income effect of village social capital is strengthened by village marketization, but weakened by regional marketization in western provinces.

“Family Welfare”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Luo Hongguang* 145

Abstract: The design of every welfare system should cohere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conven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share of chores, the rights, the obligations and the roles within family are all determined by family ethics. However,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amily economy and family welfare have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welfare culture and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 universal welfare system combining individual welfare rights and welfare obligations, which provides a family welfare perspective on the path of welfar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On Illegal Spaces *Chen Yingfang* 162

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and the author's surveys over the yea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and the complexity of illegal spaces (spaces of breaching regulation) in transitional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he author adopt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ociology of law as exploration approach and uses the space theory from new urban sociology as the fundamental analysis tool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plex narrative texts constructed by various subjects including different levels of city government, developers, relocation households, local